

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第二届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组委会特别奖

冯雪松◎著

方大曾

消失与重现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

他是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方大曾

消失与重现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

冯雪松◎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冯雪松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104-6337-2

I. ①方… II. ①冯… III. ①方大曾(1912-1937)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4843号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

作者:冯雪松

责任编辑:乔天碧

装帧设计:贺玉婷

责任印制:王宝根 苏爱玲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刷: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23.25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04-6337-2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序一

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事变和抗日军事活动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汉奇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序二 他是中国的卡帕

如果你的照片拍摄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

提起这事很多人都会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以“小方”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多篇战地报道。但不久后即在前线永久失踪，时年仅二十五岁。按照现行的说法，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这不仅仅是“想当初”，明年即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其价值的亮点还在于，方大曾留下的八百多张照相底片也已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典藏，成为珍贵的抗战文物。

去年来上海见到了老朋友张仲煜先生，那时他还在主持出版社工作，在闲聊中提起了关于方大曾的话题，他立刻表示要作个出版社的选题，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在兴奋的同时，也为他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一拍即合之后，我立刻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的冯雪松，他是十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的导演。他除了有文笔的优势外，还曾经对采访小方故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时间的投入，这个题目请他担当最好。

在中国20世纪战争摄影史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与上海有关。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再一个就是方大曾。方

大曾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两位摄影家同为1912年出生，作品风格样式和创作观念都可以和当时西方战地记者相提并论。但他们不同的历史价值在于：同为投身于抗战前线的热血青年，沙飞在山西参加的八路军，用照相机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获得胜利的始末，他留下了大量价值不容低估的有关八路军部队和解放区的叙事作品。而方大曾1937年也到了山西，随后就在他的报道《平汉铁路的变化》发表后失去消息。方大曾的摄影作品的着重点是对抗战前期正面战场作战的描述，他是中国乱世年代的极为优秀的战地新闻记者。

方大曾的传奇故事，曾打动过无数人。早在1980年前后我在参加《中国摄影史》的集体编写时，通过范长江那篇文章《忆小方》知道了小方的名字，还知道研究摄影史的前辈吴群先生，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曾经写过关于小方研究的文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和机遇所限，他没能检阅小方留下的全部作品资料。

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个机会使得我与方大曾结缘。1989年初冬，方家的一位朋友李惠元从上海到北京看望方澄敏。受方家之托，李惠元找到了原在上海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战友陈昌谦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主持工作，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与李先生只在办公室见过一面。第二天陈昌谦带我去拜访了比方大曾小三岁的胞妹方澄敏。过了没两三天，方澄敏找到了我。在我工作单位的传达室里，她拿出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方大曾拍照的八百多张底片，说这些底片我就给你们了，你拿去做研究。并附了个条子：“今天送上方大曾底片837张。”并执意表示不需要我打收条。从这一天起这个小箱子和这些底片，我陪伴了它们大概有十余年。直到2000年后我把它们归还原主人。那天和以后，老人每次来单位的见面都是在传达室，老人总是推辞怕影响大家工作，而执意不肯到办公室一坐。

方大曾当年留在家中的底片，多数底片袋上有作者

本人当时书写的编号。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四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全部洗印成样片后，发现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与方大曾在中外新闻社时所发表的新闻报道相吻合。我随后从中挑了二百多幅认为价值比较重大的，在同学吴鹏所主政的北京一家出版社暗房，放了两套稍大些的照片，并请吴鹏保存一套。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多数是从这里面来选择，也是逐渐被大家所认识的方大曾作品。

1993年台湾的摄影家阮义忠来北京。我让他看了全部底片印成的样片。阮义忠暗房技术非常好，他看后表示要借走一些底片，亲手放大制作成照片，因为阮义忠当时在台湾创办了《摄影家》杂志，他想为方大曾出一个专辑。这样我带他去了方大曾的妹妹家，征得方澄敏老人的同意后，他借去大约五十幅底片带回台湾放大制作。阮义忠回到台北以后不久出版了方大曾专辑，也就是《摄影家》的第十七辑。

1995年的时候，恰逢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时，我专门跑到方澄敏家做了一次录音采访。这是方澄敏老人唯一的原声资料，因为其后的几年，她的老伴查士铭先生去世，她也因病瘫痪并且有了语言障碍。

我与冯雪松的相识，也是结缘于方大曾。雪松极有才华，曾多次获得纪录片和新闻类政府奖项，他当时是央视纪录片导演。2000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把方大曾的事迹列入选题，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寻找方大曾》。雪松带领摄制组沿着方大曾走过的路，克服了很多困难，走了一圈，采访了一些人，比如说在保定、在石家庄，他这个路线完全是按照当时范长江写《忆小方》的那条路线。此后冯雪松被派往澳门常驻，担任中央电视台澳门记者站首席记者。

由于方澄敏大姐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些珍贵的底片归还方家后，即由方大曾的外甥、《四川日报》摄影记者张在璇先生保管。2002年的时候我到四川公干，找到了当时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刘光

孝，由他从中牵线，足球名将马明宇先生给予了慷慨资助，当时四川报业集团也很配合，挑出了一百二十幅作品，当年7月份在成都的四川美术馆用很大一个展厅举办了一个展览，主办方为中国摄影出版社、四川省摄影家协会。至此时才觉得未辜负方大曾家人的重托，肩头和心头稍有释然之感。2006年，当小方的底片由家属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时，尊敬的方澄敏大姐已经离世而去。

本书的作者冯雪松，在20世纪90年代曾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创作了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而崭露才华。从《寻找方大曾》筹划之日起，雪松就成了小方的研究者，并且投入了感情，我们也因此成为知心朋友，这也是我为《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写序的可做解释的又一个理由。事隔二十多年后，相信此书应该是他对方大曾情感与学术研究的升华。

就在雪松新著即将搁笔的时候，我在检索北京光社资料时，在一部文献中无意间发现了小方父亲的学历记录。在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的《京师译学馆校友录》（第）五级同学姓名录上这样记载：“方祖宝、别号振东，江苏无锡、法文、外交部主事、外交部科员。”这也许是本书出版前文献的再次补充。

在这篇短文中，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很多与此案有关的人名和事件，目的是铭记他们对方大曾的关注和认同。也许还应该有些值得记下的名字未被提及，但我深信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中会有完整的表述。尽管今天互联网时代的资讯发达，但仍相信读过此书的人会受到感动。不久前，一位美国新闻媒体自述作家Harvey Dzodin来访，我给他看过方大曾的作品之后，他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中国的卡帕。”

陈 申

中国摄影出版社编审、原副社长、著名摄影史学者

2014年5月20日 北京

目录

一	一部偶然的纪录片 / 001
二	方大曾和时代 / 027
三	灰房子时期的报道 / 061
四	融入生命的黑白片 / 095
五	一个人的绥远之行 / 119
六	改变命运的战事 / 151
七	纸张上的战地足迹 / 183
八	最后的消息 / 205
九	与青春相连的记忆 / 225
十	寻找 以致敬的方式 / 257
十一	几乎触碰到的气息 / 277
十二	底片的命运和归宿 / 307
十三	没有完成的句号 / 331
后记	从寻找到追随 / 355
	方大曾生平及研究年表 / 359



一部偶然的纪录片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这些精美的画面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旧式的火车，早已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布满缆绳的帆船，荒凉的土地，旧时代的战场和兵器，还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然而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生机勃勃。

——余 华《消失的意义》

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航班失联十八天后，根据英国人的探寻结论，搜索区域被定格在空旷的澳大利亚海域，不久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告了有关航班终结的消息，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的人不知所措。二百三十九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成为了永恒，一个有目的的旅行，得来的却是一个没有归程的结果，除了一声叹息，人们又能够做些什么？时至今日，已经几个月过去，寻找和猜测，困惑着整个世界，忽东又西，如此反复。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某天会真相大白，或许真相永无答案！

生命的无常是毫不由己的，也可以说自己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不过是暂时保管而已，何时何地会被取走并不会被事先告知，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有多么长，而在于属于你掌管的时间之内干了些什么。

方大曾是一个例子，今天的人们很少知道他是谁，如果我告诉你，他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临前线报道的记者，他是被摄影史家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人，他是让著名作家余华、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等人顶礼膜拜的人，你是不是会因此对他肃然起敬？方大曾与这个世界失联于 1937 年，那时候他二十五岁，身份是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也就是说他已经失踪了八十年，如果健在，今年应该是一百零五岁。十八年前，我做過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寻找方大曾》，后来很多人是通过它知道方大曾的。说到这部纪录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偶然中的机缘，也可以说是命运中的一个幸运的安排。

方大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成为第一个现场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他的摄影作品为什么到今天依然受到追捧？他在事业的巅峰神秘地失踪，究竟是源于战火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妨从一个偶然开始，随着寻找的脚步，慢慢打开问号。

1999年初，我刚刚完成历时两年七个月的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卸任总编导后，由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专题部《半边天》栏目转到《美术星空》栏目。同年10月，父亲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查出了患有食道癌，病情危重。当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加之工作中的压力和看不清晰的未来，我一下子陷入了无依无靠的茫然之中，一边在对家人隐瞒父亲病情的状况下联系医生，安排手术和后续治疗，一边又要排遣无人可以分担的困难和苦闷，那段时间简直可以用狼狈不堪或者心力交瘁来形容。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无意之中，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看到了一份传真，今天这张热敏纸还在，只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时光退却了颜色，字迹依稀，几乎又成了一张白纸，接近了它最初的模样。这份传真是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先生发来的，里面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方大曾，节录内容如下：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和大师水准的作品几乎已经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地守候。她相信哥哥没有死，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怀念。

传真是出版社希望合作推广该书的策划方案，其实，那页纸并不是明确传给我的，它和一堆报纸和信件混在一起，假如我迟一点儿去办公室，假如因为手头的事情耽搁，而没有翻看当天的报纸，我或许就不会知道方大曾了。

许多事情的因由都是由偶然开始的，当然我并不知道，这纸传真就是砸



旅行中的少年方大曾

中牛顿头顶的苹果，只是那些文字缀成的内容吸引着我，有莫名的亲切感，或许大多的必然就是因为某种关联而生成的吧。

我的职业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信息，其魅力来自于它的陌生和神秘。对于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来说，除却命题，兴趣永远是工作的第一动力，不仅记录存在，更要探寻未知。在陈申发来的这段文字中，“方大曾”“神秘地失踪”和“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成了因为我希望去发现而产生冲动的关键词语。其实，我对于许多片子的兴趣都缘于对其中关键词的兴趣。比如：“世纪女性”这个词，为了它，我和同伴们足足煎熬了两年零七个月，最终完成了这部以口述历史方式制作的、长达六百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拍摄期间，尽管困难重重，阻碍大于想象，在边探索边拍摄中，我也有过无奈、孤独、无助和苦闷，但还是愿意为这个词付出代价，兴趣使然，唯有坚持，因为我始终相信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

生活里，令人兴奋的词语很多又很少，多到可以用它们构成一整篇文章，少的时候，可以像《老人与海》中桑地亚戈老头一样连续八十四天都打不到一条鱼。我从前的一位制片人始终要求编导用一句话说明选题，不说废话，我想我是受了他的影响，为了少挨批评而得到了寻找关键词语的训练。所以，在当时那种环境和状态下，我偶遇“方大曾”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个失踪时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成了我忘记痛苦、激发斗志、走向希望的力量之源。

翻看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0—1949 部分），关于方大曾的描述不过只言片语，只是在相关联的事件中偶尔提到他。和留名于后世的同时代摄影师相比，他没有独立的篇章，没有连贯的履历，没有定论和结语，他只是一个被叫作“小方”的年轻人。关于他的介绍只有点，没有面，唯有将这些点联系起来，才能够大致看出他的简单轮廓。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美术生活》杂志）第 41 期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的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 7 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抗敌受伤将士的情况。（《中国摄影史》第一卷第 294 页）

1935 年，吴奇寒、周勉之等人在天津成立“中外新闻学社”，通过对新闻学的研究与写作，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学社除组织社员撰写时评、通讯报道，向平、津、沪等地报刊投稿外，还向国内外报刊供应时事照片。担任摄影采访工作的是原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职员方大曾，他工作深入，



方大曾在协和胡同 10 号的自拍照

目光敏锐、拍摄了许多重要时事照片，如绥远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卢沟桥事变”等。上海《申报》、《良友画报》、《现代画报》、《中国呼声》（英文）周刊，北平《北晨画刊》以及美、英、法等国的一些刊物都常采用他的照片。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方大曾是北方最活跃的新闻摄影记者之一。

“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天津中外新闻学社为底子，于 1937 年 9 月在太原成立了全民通讯社。由于战况变化，这一年年底全民社迁到武汉，之后又从武汉转移到重庆和成都。全民社成立后，正在同蒲路活动的原中外新闻学社社员方大曾，担任了全民社的战地摄影记者。所以全民社在武汉时除发文字稿外，还发照片稿。不久因与方失去联系，战地摄影没有来源，这项业务就停止了。（《中国摄影史》第一卷第 336 页）

“七七”抗战的战火燃起后，平津的记者首先赶到卢沟桥采访。中



在中法大学读书期间的方大曾

外新闻社有个青年人名叫小方(原名方大曾),拍摄了《日军炮击卢沟桥》、《中日对峙中的宛平城》、《奋勇杀敌二十九军》等照片。7月29日《中报图画特刊》以《卢沟桥战事景象》为题,用中外社名义作了集中报道。(《中国摄影史》第二卷第103页)

当时在华北和西北进行摄影报道的还有小方、柏气德、李荫、师石、席与群等人,他们的作品,也都在上海画报上刊载。(《中国摄影史》第二卷第106页)

方大曾在抗战开始时曾在平津和山西一带活动,后来渺无消息,很可能在前线牺牲。(《中国摄影史》第二卷第108页)

有关方大曾,《中国摄影史》所提及的部分大致如此,这些描述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个活跃在抗战初期的战地记者、多家刊物的供稿人,根据其称呼“小方”来判断,直觉应该是个有朝气的年轻人。而此时,我因为拍摄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的缘故,对于口述历史、旧时代的资料影像以及探寻鲜为人知的故事颇为着迷,方大曾再一次唤起我对于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冲动,兴奋点来自于想了解他所留下的近千张底片中都拍了些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失踪后有无指向性的线索,世上还有谁曾近距离地接触过他,以及是否还有后人健在。疑问是探寻秘密最好的动力,何况我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